

历史与现实的叠合:对《九三年》的主题再探讨

张玉芬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 评论界尤其是国内,对《九三年》的评论意见大多集中于两个方面:一、它取材于法国大革命并再现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场景;二、雨果在这部小说中宣扬了超阶级的“人道主义”观。此外,也有人论述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及情节组织,但最后的归结点无外乎以上两个方面。《九三年》尽管有很多浪漫主义特征,仍被大多数读者和批评家当作一部“历史小说”。然而小说的“历史叙事”却不断地被“心理叙事”修改和置换,本文将讨论这两种叙事是如何运作的,也就是说,现实矛盾如何通过叙事得到想象性的解决。

关键词: 雨果;《九三年》

雨果晚年创作的这部小说糅合了雨果的人生经验和世界观,不仅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回顾,更曲折表达出他对当时法国政治矛盾的想象性解决。进一步说,《九三年》里始终存在两种相互交织的叙事。处于小说表层的是以历史上的“大革命”为描写对象的“革命叙事”或曰“历史叙事”,相对于此,作者的心理结构对文本形成发挥了潜在的作用,我们姑且称为“心理叙事”。心理叙事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再处理,使作者潜在的主观愿望得到表达。在文本中这两种叙事的关系是不平衡的,“历史叙事”似乎在小说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取得了明显的美学效果:由于作者对政治的偏爱,以及小说本身努力营造的史诗氛围,同时,我们还可从作者的心理角度来进一步探讨小说的悲剧性。

——
尽管新批评派不主张把作者的经历与作品的

关系看得过重,并把从作品产生的时代以及作者生平中寻找材料来解释作品的做法称为“起因谬误”,但必须承认,任何一部作品都会留下时代的印记。因此在进行文本分析之前,适当地回顾一下雨果创作《九三年》时的法国社会现实和雨果当时的经历,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雨果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以及这一题材在作品中的处理。

《九三年》创作于1871—1873年。1970年,在普法战争正酣时,在外流亡了19年的雨果从布鲁塞尔返回了巴黎。这场战争引发了雨果心中久经压抑但却从未消减的政治热情。昔日的文坛地位和与生俱来的领袖气质使他很快成为他周围一群人的精神向导,这些人,连同他自己,都觉得他多少能左右当时法兰西的命运。他情绪激昂,换上国民侍卫队的军服,走上街头,向发往战争前线的士兵献诗,并先后发表《告普鲁士士兵书》和《告巴黎人民书》。但他所依赖的法国护国

收稿日期:2002-11-15

作者简介:张玉芬(1976-),女,山东聊城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政府开战不久后就与俾斯麦秘密会谈,出卖了巴黎人民。色当会战和和约签定使雨果倍感失望。而随后的丧子之痛更使他对时局心灰意冷,以致于对蒙马特尔高地的炮声并没有太在意。当巴黎公社的社员们在为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浴血奋战时,他扶着儿子的灵柩去了布鲁塞尔。所有关于巴黎的事,他都是通过看报纸来了解的。持资产阶级立场的媒体把这次起义描绘为低层民众与政府的对抗。对久受流亡之苦的雨果来说,这更是一场在法兰西最需要稳定和团结时将局势引混乱的内战。这种观点决定了雨果对巴黎公社运动的态度,他谨慎地与这一运动保持距离,“公社!这会好到哪里去?特别是把公社和可鄙的国民议会加以对比时更是如此。^[1]巴黎公社起义者推翻了旺多姆广场上的拿破仑的铜像,如果我们记得四十多年前雨果曾专门为该铜像写过一首颂诗的话(这首诗被看作是雨果的思想由保守转向自由的标志),这一举动无疑具有某种象征意味:它暗示了巴黎公社运动和雨果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儿“拿破仑的铜像”需要进一步的解读:它作为雨果政治共和思想的奠基,尽管四十多年来雨果在感情上对它矢志不渝,它的内涵却发生了潜在的转变。如果说在1827年是个人、力量的象征,在1872年则是“神圣”“光荣”“秩序”的象征。

二

我想从小说的人物形象入手,来分析文本中的“历史叙事”和“心理叙事”之间的关系。正是在潜在的“心理叙事”和表面的“历史叙事”的融合与冲突中,暴露出雨果在反思法国大革命时的复杂心态,和他作为一个有贵族倾向的老年人对现实矛盾的想象性的解决。这部小说塑造了三个主要人物:朗德纳克、西穆尔登和郭文。在分析之前,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前提:《九三年》作为典型的早期小说,其剧中人物与后来的现代主义小说中的人物有着很大区别。古典小说中的人物不像现代小说中的那样具有独立意识,而往往过多地渗透着作者的主观意志,属于表达作者见解的“功能性”人物。所以我们很容易识别出作者赋予这些人物的象征意味,在《九三年》里尤其如此。据此,朗德纳克、西穆尔登和郭文等人物与其

说是独立的生命存在,不如说他们组合成了一套阐释符码,作者藉此表达了对革命的理解以及对当时的社会矛盾的想象性解决。根据格雷马斯的符号语义学,文本意义的生成有赖于不同性质的义项的对立与组合。借此,我们可以考察《九三年》中人物性格的异质性关系。鉴于这些人物身上明显的象征效果,我们可以参考格雷马斯的“语义矩阵”来分析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文本意义的影响。

小说中的人物直接对应着大革命中的不同的社会势力:朗德纳克是保王贵族,旺代叛军的首领,代表着“反革命”;而西穆尔登作为公安委员会的代表,则具有大革命本身的一切特征,狂热、坚持原则、严酷无情。这两个人物对革命的态度截然相反,但在其他方面却惊人地相似:年老、坚毅、对敌人残酷无情。“我们必须说,侯爵和教士这两个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人”。

根按第一种叙事即“历史叙事”,这部小说的基本主题是正确处理“革命”与“暴力”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想当然地勾勒出由这两种因素及其相反项构成的矩阵结构。其中“革命”与“反革命”形成一种对立关系,而“暴力”与“非暴力”形成次对立关系。而且我们会发现,小说中的人物的性格正好是这些对立因素的组合:西穆尔登是“革命”和“暴力”两种因素的组合,朗德纳克则是“反革命”和“暴力”的集合体,郭文则集中了两种积极因素“革命”、“非暴力”。现在,我们已有矩阵的三个义项,却还缺少能体现“非革命”和“非暴力”组合的最后一项。在我看来,这一义项集中体现在对小说情节发展起了关键作用的三个小孩上。他们没有参加革命活动,(至于作者可能赋予他们革命者的象征寓意,则需要另一层面上加以阐释),而且有着未谙世事的天使般的纯洁,是以暴力的对立面出现的。至此,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和性格特征可构成一个矩阵:

西穆尔登	朗德纳克
(革命、暴力)	(反革命、暴力)
郭文	三个小孩
(革命、非暴力)	(非革命、非暴力)

在这个根据“历史叙事”模式形成的矩阵中,作者对剧中人物的态度似乎是不需说明的。朗德纳克是彻头彻尾的反面人物,作为王室贵族,其存

在正在失去历史合法性,却仍想靠愚昧的农民夺回昔日的统治地位,他勾结外国势力的卖国行径比对枪杀妇女的残暴更让作者觉得不可原谅。西穆尔登的分裂性格反映了作者对大革命的矛盾心态,他是公安委员会的代表,富有博爱精神和革命热情,但他的冷酷无情却给革命蒙上一层恐怖的阴影,他的动机是将民众引向光明,但整个人身上却弥漫着一股死神气息。他的性格缺陷与他的高尚品格密不可分,这不仅了造成他个人的不幸命运,也导致整个小说的悲剧结局。而郭文,则文武双全,抱负远大,性格几近完美,唯一的缺点是对敌人太宽大(而这一点正是作者大加赞许的)。这一形象实际上是作者理想的化身,尤其在阐释对革命的见解时,简直是雨果的代言人。在赞成革命这一点上,他和西穆尔登一样坚定不移,但他反对用恐怖政策,主张人道主义的宽大,他要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中建立乌托邦,最后为救一个俘虏而牺牲了自己。

按照“革命”和“反革命”这一阐释模式,作者的态度一经确认便不容变更,小说情节的进展就是这些不同象征势力之间的关系的转化,直到小说结局郭文、西穆尔登双双死去,朗德纳克得以逃生——象征着理想的革命被现实的革命所扼杀,革命本身也因“内耗”遭到暂时失利。这种阐释模式,尽管对人物与他的社会象征给予足够的重视,却很难解释小说的一些关键情节(例如朗德纳克救三个小孩和郭文放走朗德纳克),而只能草率地将之看成是作者“人道主义至上观”的表达,从而理想人物郭文的死,只不过是作者用资产阶级人道观调和阶级矛盾的失败。应当指出这种阐释的不充分性,它以一个未经推敲的假设为前提,并夸大了这一假设对小说叙事的决定作用。这个假设将雨果的政治思想简化为一组二元对立:雨果拥护革命,但反对革命暴力。实际上雨果的政治思想决非如此简单。要准确描绘雨果的政治立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不仅因为他曾有从保王派到共和派的转变,和由贵族院议员沦为长期流亡者的经历,更因为他是一个思想丰富的天才,一个有政治情结的文学巨人。他具有贵族秉性,但更多的是自由思想。他憎恨败坏法兰西的新旧权贵,支持民众追求的革命,他反对所有形式的暴力,并同情所有时候的弱者。在文学上的雨

果与政治上的雨果之间,在有贵族倾向的雨果和支持革命、自由的雨果之间存在着一个悖论。要使问题得到解决,必须联系到作者的心理结构,考察小说的“心理叙事”如何在“革命叙事”的遮掩下发挥作用。

三

我们的分析完全可以从一些次要人物和看似无关宏旨的情节入手。这些次要人物像红帽子联队(包括曹长、女酒保)、佛胡莎和她的三个小孩、阿尔马罗、退尔马克等等。他们对小说的叙事起了牵针引线的作用。由剧中主要人物构成的矛盾关系因这些次要人物的不断加入而转化冲解。从这个角度来看,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也处于一种互动的位置上。不仅如此,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安置和描绘,作者对历史、现实的看法得到了或隐或显的表达。

其实,其实雨果对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小说在第一章中就有所体现。在森林里代表革命的红帽子联队遇上了饱受战争之苦的佛胡莎与她的三个孩子。双方充满潜台词的几处对话显示了作者对造成了恐惧和混乱的革命的嘲讽。

“你的祖国是哪一国?”“我不知道”……“我懂了,先生。你是法兰西人,我是布列塔尼人。”……“你道为什么不留在房子里?”“因为他们把房子烧掉了。”“他们是谁?”“我不知道。是打仗。”“你打哪边来?”

“打那边来。”“你到那里去?”“我不知道。”“照实说,你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吗?”“我们是逃难的人。”“你是哪一党?”“我不知道。”“你是蓝的还是白的?你跟谁在一起?”“我跟我的孩子在一起。”^[2]

操着满口革命话语的曹长与毫无革命意识的农妇佛胡莎的沟通困难,虽然一方面表明了旺岱农民革命观念的淡薄,但更有力的显示了革命带来的战争暴力给平民百姓造成的恐惧心理。如果说,两人的对话体现了革命的力量以话语的方式遭到抵制,那么女酒保的职责更是对革命行为本身的消解:她作为革命军的酒保,也把酒给对方士

兵喝,这使得她不像一个革命战士,而是一个调停使者——穿梭于两军之间,“让临死的人互相握手”。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革命史册上占据重要位置的几位革命领袖马拉、罗伯斯庇尔和丹东,在小说中却是基本上作为背景人物出现的,作者在描绘这三个人物时,笔调很难说是不带讽刺意味的。他们在一家阴暗的小咖啡馆里出场了,像“三个地狱里的判官”。他们各执一词,互不信任,在最需要团结的时候却互相攻击。作者对他们死期的反复强调,预示着革命的短暂寿命。他们操纵着革命的方向,也对小说情节的发展起了间接的决定作用:正是他们派西穆尔登去监视郭文,并最终造成两人的死亡。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本身是辉煌业绩,作者对这三位革命领袖的形象塑造显然是“反历史”的,这再次暴露出“历史叙事”的自身抵牾之处。我们最好从小说的“心理”叙事机制入手,对文本重新加以考察。

重读最好从主要人物之一的朗德纳克开始。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在这个人物身上雨果内心思想的复杂性得到了充分体现。作者想把他塑造成一个残暴的反革命头目,但从另一角度看,小说呈现给我们的却是一个颇具魅力的“老年英雄”。这正是“心理叙事”发挥作用的地方,作者的潜意识的愿望通过这个人物的曲折的方式表达出来。暂时从历史叙事中摆脱出来,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与作者年龄相仿的老人,而且同样具有贵族气质并精力充沛。不得不承认,作者的“力比多”不自觉地投射到这个“反革命”人物上。这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雨果早年与王室的密切联系,小说中象征王室的“百合花”等意象也因此显得暧昧复杂(在雨果的早期颂歌中,“百合花”是一个常用比喻)。当然我们不能将“朗德纳克”看作是雨果的保王思想的简单复活,正如雨果绝不会由共和派退回到保王派一样。或许我们应将“朗德纳克”看成一个寓意更大的象征,象征着“过去”或者“历史”本身,一个和现实或革命相对的客体。在雨果眼里,它拥有现实所缺乏的东西:权威和秩序、神圣和光荣以及持久的生命力。这些旧时统治的“优势”对现实具有弥补和借鉴作用。这一人物在从某种程度上反衬出革命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它的非理性,它造成的混乱以及它的短暂寿命。

四

《九三年》中有一名为“圣巴德罗缪大屠杀”的独立章节,其情节非常简单:布列塔尼农妇佛胡莎的三个小孩被朗德纳克扣为人质,关在了古堡拉·杜尔格的图书室里。孩子们很偶然地发现了《圣巴德罗缪》这本颂扬殉道者的圣书,于是完全出于儿童的破坏欲,他们将这本圣书撕得粉碎,完成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圣巴德罗缪大屠杀”。这看似简单的描写实际上蕴涵了丰富的象征行为,对揭示本书主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首先,“圣巴德罗缪大屠杀”的本事是对大革命的隐喻。表面上看,两者确实有相似之处:都是当权势力对弱势群体的暴力行为,而且弱势群体都是教徒。但这种说法无疑掩盖了两次事件的本质区别:1572年是法国国王对手无寸铁的无辜教徒的大屠杀,这次却是新生的革命力量与维护旧时统治的较量。于是一向同情弱者的雨果在理智上坚持革命的必然性的同时,在情感上却站在了“旺代”一边。但只有联系到雨果写《九三年》的现实——当时的巴黎公社革命时,我们才会发觉圣巴德罗缪大屠杀的深层所指:在这个层面上梯也尔的临时政府显然是屠杀者,而处于包围之中的巴黎公社社员们是牺牲品,尽管这次“暴力”首先是由他们发动的,却因势单力薄处于劣势,自然赢得了雨果的同情。

巴德罗缪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是基督教史上一位有名的因殉道而死的圣人,在“神圣”、“光荣”等寓意上几近基督——所有巨大苦难的承受者。“殉道者”是雨果小说以及诗歌中经常出现的形象,它作为道德的化身,也常常成为雨果阐发其人道主义的工具。在《九三年》中,这一形象无疑也具有这一功能。如果追溯到雨果1820年代作品的话,尤其是写旺代战争的诗歌,我们会发现,充当“殉道者”的大多是在旺代叛乱中被杀的农民。那时,正处于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受国王津贴的雨果政治上也相当保守,与王室的密切联系为他以后的根深蒂固的保王思想埋下了基石。这时他的文学观念还不成熟,深受“天主教”派文学主将夏多布里昂的影响。而夏多布里昂作品中的“殉道者”是完全以革命的“牺牲品”的寓意被

夏用来否定大革命的。这种对“弱者的同情”仍残存在雨果的思想中。但在《九三年》里,“殉道者”却是一个内涵丰富的能指。

此外,三个孩子毁坏圣书的象征意味同样明显:无论在“新生之物”还是“非理性”的意义上,三个孩子极易让读者联想到历史上的革命者,尤其是在第二部详加描绘的三位革命领袖:罗伯斯比尔、丹东和马拉。与此相对应,象征着“光荣”、“神圣”的法国历史的“圣书”,成了革命的对象。这个象征折射出雨果对革命的看法,而且他显然不想掩饰这种象征效果。于是,宏大的历史叙事被改版成儿童戏耍的游戏:年逾七旬的作者在审判他前辈的革命行为时,自认为态度是足够宽容的,革命者虽然做出破坏行为,但理应原谅,因为这是时代所犯的“错误”,因为革命本是“不可知神”的行动。雨果在对巴黎公社革命时表现了相同的态度,他不赞成巴黎公社暴力的革命方式,但在情感上又站在革命者一边,认为起义者犯的“罪”是“无意识”的,因而可以得到宽恕——“如果我是基督,我就原谅犹太”。至此,我们会发现创作主体的主观愿望在文本中的隐秘表达:雨果在潜意识中把自己当成承受一切罪过与苦难的“殉道者”,他以一种道德上的高度对革命(包括1789年大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进行审

断,并愿为革命的过失承担责任。这正是他的矛盾之处:他认识到革命难以把握,却势在必行,于是把革命当成一个类似命运的非理性的客体,并企图用永恒的人性(这显然是一个有待解构的概念,雨果用它来指“真理”、“正义”以及“光荣”等等)来驾驭革命。雨果很清楚他的政治理想是难以实现的,在这一点上,小说结局处郭文的死是作者政治生涯的象征。而当我们再次回到小说的创作语境时,会发现画像中的圣巴德罗缪这是对现实中雨果本人处境的隐喻:既然无法实现用实际行动,但思想上又无法割舍,只好退身出去,以旁观者的角度审视正发生的一切,并最终用殉道者的精神赎救双方的错误。这一形象表达了对现实矛盾的想象性解决。在“撕殉道者的画像”这一情节中,更体现出作者用个人的牺牲来换取民族生存的愿望,这里面虽然有作者因阶级局限而对革命的误解,却无疑加深了小说的悲剧性,展示了雨果作为伟大作家的真诚的灵魂。

参考文献:

- [1] (法)安德烈·莫洛亚·雨果传[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 [2] 雨果·九三年[M]. 郑永惠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Overlap of History and Reality: Reinvestigation of the Theme of *The Year of 93*

ZHANG Yufe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Comments and critiques on the novel *The Year of 93*, especially those by Chinese critics, mostly concentrate on two aspects: one is that the novel draws its subject matter from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and reproduces its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e other is that the writer propagates the concept of humanitarianism that transcends classes in the novel. But in my opinion, this novel contains both the life experience and the world outlook of the writer. It is not only a review of the great French Revolution, but also an imagined solution to the political contradiction of that time in French. We can say there are two kinds of narration in the novel: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narration. The psychological narration makes the writer's subjective wish turn into reality. The paper discusses how these two different kinds of narration are employed in the novel, that is to say, how the real contradiction is solved.

Key words: Yugo, *The Year of 93*

(责任编辑:吴晓明)